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 (CND) 主办 • — • — •

—— 增刊 第六六一期 ——
(二〇〇八年七月二十二日出版)

本期目录 (zk0807e)

【史海钩沉】	不安的岁月，受挫的岁月（1962～1965年）	张戎
【春秋史笔】	毛泽东的个性特征与理想实质	周伦佐
【自由论坛】	对“贬周捧林”思潮的看法	李志宁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museums.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投寄 tougao@cnd.org。请在 subject 中标明 CR 字样。

【史海钩沉】

不安的岁月，受挫的岁月（1962～1965年）

• 张戎 •

1962～1965年，（毛泽东）68～71岁

一朝经济好转，毛就一步步走向大复仇、大清洗。他首先停止了“包产到户”、为受害者平反等开明措施，斥之为“单干风”、“平反风”。毛加强了个人崇拜，对他的歌颂逐渐充斥了学校教科书、出版物、媒体。人们睁眼就看到三呼万岁的口号，耳边响起的音乐都是“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全中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彻底地化入对他的顶礼膜拜。

文化方面毛拿小说开刀。一九六二年九月，他说：“现在不是小说、刊物盛行吗？利用小说来进行反党活动，这是一大发明。”针对读书，他说：“书读的越多越蠢。”“书可以读一点，但是读多了害人，的确害人。”毛本人似乎不怕被“害”，他的特大木板床的一边总是堆满了书。为了以防书落下来打着他，睡人的一边床脚垫高了一点。毛最喜爱的消遣是待在床上看书。但是他不要中国人民看书，要让他们保持愚昧状态。毛对中共高层讲：我们需要“愚民政策”。

一九六三年春，毛的刀伸向传统戏。毛本人其实是个戏迷，收藏了两千多盘磁带唱片，还能同演员讨论演唱风格。看戏是他唯一在公开场合戴眼镜的时候，他也看得非常投入。有一次

看《白蛇传》，他哭出了声，毫无顾忌地擤鼻涕，高潮时还一跃而起，裤子都掉了下来——原来卫士为了他看得舒服，在他坐下后帮他松了裤带。

毛泽东爱看戏并不妨碍他一上台就对大批戏剧宣判死刑。现在他要把传统戏全部赶下舞台。首先做了刀下鬼的是“鬼戏”，戏中屈死的冤魂向害死他们的人报仇索命。看见这些舞台上的复仇者，毛难免不会想起他的政策害死的几千万人。

一九六三年底，毛把炮火对准整个艺术领域：“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他说这些艺术都是“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有“大问题”。就连歌颂共产党的作品，也以这样那样的理由被打成“毒草”。艺术家下放劳动，接受“改造”，一九六四年二月毛以他特有的风格说：“要把唱戏的、写诗的、戏剧家、文学家赶出城，统统轰下乡……不下去就不开饭”。

中国传统建筑也成了牺牲品。中共掌权后不久，牌坊和城墙就被不分青红皂白地推倒。一九五八年，对北京八千处古迹，毛只让保留七十八处。连北京市长彭真都竭力反对，最后这一计划当时没有完全实施。但由于毛的坚持，几百年历史的城墙、城门楼还是大多被拆掉，拆城墙的土填平了市内一座美丽的湖。

毛在一月二十八日讲：“南京、济南……（省略号系原文）的城墙拆了我很高兴。”他嘲弄心疼古迹的知识分子：“有的人为了拆城墙伤心，哭出眼泪，我不赞成。”“北京拆牌楼，城墙打洞，张奚若也哭鼻子，这是政治。”破坏古迹的“劳动”，知识分子还必须参加。中华民族灿烂文明的标志，就这样一片片从地球上被抹去。

毛在不少场合都表示过他对中国建筑的讨厌。在为大跃进铺路的南宁会议上他说：“北京、开封的房子，我看了就不舒服，青岛、长春的房子就好。”另一回插话时说：“青岛、长春最好。”北京、开封是古都，而青岛从前是德国殖民地，长春是日本建来作满洲国首都的。

毛不许建造中国传统式的房子。执政初期，建筑设计师们沿袭过去的民族风格盖房子，被斥为“复古主义”受到批判。一九五九年中共建国十周年时要修一些纪念性建筑，基本上是模仿苏联。这些建筑还算稍有美感，但是凤毛麟角，其余的不是工厂，就是丑陋省钱的火柴盒式的水泥住宅。

天安门广场原来有十一公顷。但毛要的是“能容纳一百万人集会的世界上最大的广场”。于是广场扩大了四倍，变成一片其大无比的水泥地。充满古城风味的建筑被一扫而光。

毛的“打倒”清单上还有寺庙和古墓。一九六四年底，他以前的秘书胡乔木写信给他，说杭州“苏小小墓等，正在被清理当中，您多年以前就提出的主张，在现在的社会主义革命新高潮中总算有希望实现了。”毛在这段话旁批道：“这只是一点开始而已。”“今日仅仅挖了几堆朽骨，便以为问题解决，太轻敌了，且与事实不合……至于庙，连一个也未动。”甚至连花草，毛也不容。一九六四年七月，他对“宫廷大总管”汪东兴说：“摆设盆花是旧社会留下来的东西，这是封建士大夫阶级、资产阶级公子哥儿提笼架鸟的人玩的。”“现在要改变。”“你们花窖要取消，大部分花工要减掉。”

毛要把中国变成一个文化大沙漠，这里没有文明，没有人性，没有温情，只有一群充满兽性的人头畜生，为他干活，作他血腥清洗的工具。在这一点上，毛比希特勒、斯大林更极端。希特勒尚且允许一些非政治性的艺术存在，斯大林保存了俄国的古典文化。毛还为此批评斯大

林，一九六六年二月说：“他对俄国和欧洲的所谓经典著作却无批判地继承，后果很坏。”

毛泽东的扼杀文化不得人心。就像人不喜欢挨饿一样，没人愿意过没有娱乐、没有色彩的生活。毛的干部们从上到下给他来了个阳奉阴违，一些非政治性的、“无害”的娱乐活动和文艺形式继续存在，花草依然茂盛。一九六二到一九六五这几年中，毛暂时无可奈何。

但在这个期间，毛对全国人民的洗脑运动卓有成效。其中一个“学习雷锋”。毛用死去的士兵雷锋做榜样，要大家都变成雷锋似的人。有一份雷锋日记，说雷锋如何一想到毛就去“做好事”，如何为了毛“上刀山、下火海，也心甘情愿。”听毛主席的话，做“螺丝钉”，毛安到哪里就在哪里老老实实地干，被表彰为最崇高的理想。抹煞个人与个人崇拜相辅相成，完全无私与极端自私正好配套，前者是对中国人民的要求，后者属于毛泽东。前者为后者服务。

雷锋还代表毛刻意想培植的一个观念：人人必须仇恨。雷锋日记里最有名的一首诗写道：“对待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温暖……对待敌人要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仇恨的逻辑是：“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人民的残忍。”

该仇恨谁呢？毛树立了一个靶子：赫鲁晓夫。原因？他搞修正主义。中国报纸上连篇累牍的是谴责赫鲁晓夫和修正主义的文章，在每周的“政治学习”中灌输给全国人民。这些遥远的敌人就这样在人们脑子里扎下了根。到毛整刘少奇的时候，他把“中国的赫鲁晓夫”，这顶帽子戴到刘头上，而得罪了毛的中共干部都被说成是“搞修正主义”。

毛第一次用“中国的赫鲁晓夫”这个字眼，是在一九六四年六月八日的中共高层会议上。刘少奇马上明白毛是针对他的，毛复仇的一天就要到了。除了束手待毙，刘唯一的出路是设法加强自己的地位，使毛不容易对他下手。这时搞的“四清”运动，就是刘少奇用撤换鱼肉村民的基层干部的办法，争取人心。不久，莫斯科出了一件事，给了刘少奇另一个机会。

这年十月十四日，赫鲁晓夫在“宫廷政变”中下台。当时中国导弹在研制方面遇上了难以逾越的难关，毛急需苏联的技术，他想跟勃列日涅夫（Leonid Brezhnev）等苏联新领导人改善关系。几天之内，周恩来就对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说，毛“极希望”增加接触，有意派代表团去莫斯科祝贺“十月革命”节，请苏联发邀请。

苏联新领导人也对重修旧好很感兴趣，赫鲁晓夫下台的事在公开宣布前先通知了毛。但很快地，他们便意识到，只要毛在台上，改善关系的前景黯淡。契尔沃年科告诉我们，他是怎样得到这种印象的。“我到毛的住处大约是晚上十一点。毛听到消息后，沉吟片刻说：‘你们做得好，但是还不够。’会见完毕毛送我出门。汽车发不动，我的司机拿了个桶跟毛的警卫到厨房去取水。毛站在熄火的汽车旁，月光闪闪地照在湖上。他说：‘还有些事你们要改，你们的主席团还没都做到。’”——毛要苏联改变党纲，否定对斯大林的批判。这对苏联新领导人来说是完全不可能的。结果，在周恩来率团访苏时他们试探了一下，看中共能否搞掉毛。

十一月七日，克里姆林宫举行的“十月革命”节招待会，周恩来和中国代表团走来走去向老相识们敬酒。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Rodion Malinovsky）带着苏联的主要中文翻译走到周恩来跟前，冷不防对周说：“俄国人民要幸福，中国人民也要幸福，我们不要任何毛泽东，不要任何赫鲁晓夫来妨碍我们的关系。”周恩来勃然变色，对马利诺夫斯基说：“你的话我不懂。”立刻转身走开。马利诺夫斯基又转向因林彪生病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贺龙元帅，说：“我们现在已经把赫鲁晓夫搞掉了，你们也应该效仿我们的榜样，把毛泽东也搞下台去。这样我们就能和好。”马利诺夫斯基还使用了粗野的语言：“我穿的元帅服是斯大林的狗屎，你穿的元帅服是毛泽东的狗屎。”贺龙跟他争执起来，随即中国代表团离开了宴会大厅。

这天晚上，周恩来大半夜未眠，起草给毛的电文，报告事情经过。第二天，勃列日涅夫率领四位同事来到中共代表团驻地，周恩来正式提出抗议，要求他们澄清。勃列日涅夫道了歉，说马利诺夫斯基喝醉了，不代表苏共中央。可是，马利诺夫斯基酒量很大，就算是喝醉了说胡话，作为苏联国防部长，鼓动中国总理和军队负责人搞政变，苏联领导事后却没有处罚他。所有迹象表明，马利诺夫斯基的话是装醉故意说的，以试探周、贺。苏联当时对华主要情报官员在我们访问时回答：“我们了解到我们不可能把周恩来和毛泽东割开。”

马利诺夫斯基事件使毛泽东疑心大起，怀疑中共高层有人跟苏联合伙要密谋推翻他。对毛来说，只要没有苏联插手，中共党内什么样的反对者他都能对付。彭德怀在一九五九年，刘少奇在一九六二年，两次都未能动摇他的地位。可如果克里姆林宫下决心搞掉他，和他的党内反对者里应外合，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从外蒙古到北京只有五百公里远，一路坦荡平原，中国没有有效的反坦克武器，无法阻挡苏联坦克的推进。就在马利诺夫斯基事件发生的第二个月，根据毛的指示，中国军队开始在通向内蒙古的平原上堆筑形同庞大碉堡的“人造山”，以抵御苏联坦克。

这些人造山按设计每座高二十至四十公尺，正面宽二百五十至四百公尺，纵深一百二十至二百二十公尺。天文数字的钱投了进去，石头和土方从远方运来，在山里建立了钢筋水泥的工事。凡是见过这些山的人，包括美国前国防部长施莱辛格（James R Schlesinger），都认为靠这几座孤零零的人造山来挡住苏联坦克大纵深、宽正面的进攻，根本不可能。后来这项工程不了了之。

毛相信明智的周恩来不会干政变这种没有把握的事。周从此更是战战兢兢地避嫌。离开莫斯科的时候，他感慨万端地说，他以后将很难再来苏联了。的确，中共执政后他访问苏联十次，这是最后一次。这也是毛在世时最后一个中共高级领导对苏联的访问。就连跟苏联领导人在第三国会面也得回避。一九六九年九月，胡志明去世，周恩来不得不去参加葬礼，这就产生了会碰上苏联领导人的问题。为了跟苏联领导人错开，周恩来不顾越南人的反对，在葬礼前硬跑到河内去，向胡志明的遗体告别，然后匆匆飞走。胡志明葬礼举行时，中国只派了一个级别较低的代表团参加。

在文革中，任何跟苏联的关系都被当作“苏修特务”来严加审讯，尤其在中共高层。那位不幸被马利诺夫斯基挡住说话的贺龙元帅，更是毛泽东疑心的焦点。贺和大批部下被抓起来审问，贺本人于一九六九年悲惨地死在囚禁之中。

贺龙一案受株连的最高将领是国防部副部长、装甲兵司令许光达大将。在被关押的十八个月里，他受审四百一十六次，多次遭到严刑拷打，最后死在马桶上。许光达是在马利诺夫斯基事件后唯一去过苏联的高级将领。那是一九六五年五月，中、苏之间在原子技术合作方面藕断丝连，总得有人去。许去了以后，毛又怀疑他在克里姆林宫与自己的政敌之间穿针引线，马上撤回在苏联杜布纳原子研究所（Dubna Nuclear Centre）的全部中方人员，与苏联核技术的关系从此一刀两断。

当马利诺夫斯基事件发生时，毛并没有叫周恩来马上回来。周按原计划继续跟苏联领导人和一队队外国代表团会见。十一月十四日，周回到北京，毛率领全体领导人到机场欢迎。这是给莫斯科递信号：中共的团结牢不可破。可是苏联人看出了破绽。在机场的苏联外交官观察说毛看上去气色糟透了，“好像要虚脱一般”。

这是毛最不安的时刻。刘少奇乘机巩固自己的地位。他的办法是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再度当上国家主席，同时借助当选来造声势，树形象，搞一点对自己的个人崇拜。

上一届全国人大是一九五九年开的。本届按宪法应该在一九六三年开，但毛不发话。他想在整刘少奇的时机成熟时再开，一开就把刘搞掉。马利诺夫斯基事件发生后，在刘少奇的主持下，当月二十九日就做出了召开全国人大的决定，而且开幕时间定在十二月二十一日，还不到一个月的准备时间。刘算准了毛此时心中无底，不敢否决开会，也不敢否决当主席。毛看出了刘的用心，怒气冲冲地说：“现在就交班，你就做主席，做秦始皇。”

毛只拒绝在开人大之前照惯例召开中共中央全会，这在毛当权时绝无仅有，毛以此表示对刘的不认可。人大开幕的前一天，毛在政治局会议上以谈“四清”为名，借题发挥骂刘：“有那么多步骤，我就不赞成。”“你专搞老实人，不会办事。”“中国的秦始皇是谁？就是刘少奇。”

会场外，毛对他熟悉的陶铸夫妇发作道：“有人就是往我的头上拉屎尿！”陶铸夫妇猜到他指的是刘少奇。几天后是毛的七十一岁生日，毛破例地请刘少奇赴宴。毛几乎从不请他的共产党同事吃饭，与他们的社交仅限于在跳舞会上。那天吃饭前，毛的女儿李讷听说爸爸要在人民大会堂请客，也要跟着去，毛对李讷说：“你今天不能去，爸爸我要骂娘。”席间毫无喜庆气氛，在满座鸦雀无声的紧张空气里，毛嬉笑怒骂，大讲“有人搞独立王国”，搞“修正主义”。稍知情的都明白他的锋芒所指。

可是，没有人顺着毛说话，没有人参加对刘的攻击，只有毛从前的秘书陈伯达除外。陈伯达看到毛对刘不满，在第二天的全国工作会议上发言，把毛的话从“理论”上加以发挥。毛对他的擂鼓助威感激有加，当夜把在安眠药力下昏昏沉沉的陈伯达找去面授机宜，说他要搞掉刘少奇。陈伯达成了最早知道毛意图的人。文革开始时，陈被毛提拔为中央文革小组组长、中共第四号人物，根源就在这里。

一九六五年一月三日，刘少奇再度当选国家主席。全国上下组织了欢庆活动，和他一九五九年首次当选时大不相同。街头敲锣打鼓的游行队伍拿着彩旗，舞着狮子，放着鞭炮，并排举着毛和刘的像。报纸上连篇累牍地报导：“毛主席刘主席都是我们最爱戴的领导人”。很明显，在中共高层，有相当多的人在暗暗为刘使劲。刘在制止饥荒上的功劳使 he 有了众多支持者，就连毛的亲信也觉得刘“行”，“有办法”，跟他“感到对路”而同毛疏远。甚至还有人建议，刘当选时在天安门城楼挂刘的像，而不挂毛的！（当时毛的像只在节庆时才挂在天安门城楼上。）刘赶快否决了这个提议。

正在选举刘的当儿，刘夫人王光美被召到人民大会堂的“一一八”。刘当选后走进来，看见妻子在场，一愣。毛劈头盖脸辱骂了刘一顿，仇恨之意溢于言表。刘跟妻子僵坐在那里，默然对视。毛知道刘少奇夫妇相爱至深，他要王光美在场，看丈夫受辱，也是教刘明白他的妻子难逃厄运。

毛对刘的切齿痛恨都这么明显了，高层也没有谁站出来跟毛一起骂刘。相反地，人们为“两个主席之间的争执”表示焦急，无所适从，出来“劝架”，叫刘少奇要顾全大局，要谨慎，要尊重毛泽东。刘去找毛作“自我批评”，又在政治局会议上检讨“对主席不够尊重”。毛话中有话地说：“这不是尊重不尊重的问题，而是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的问题。”

斯大林曾针对铁托说过：“我动一根小指头，世界上就没有铁托了。”学斯大林学到家的毛泽东也对刘少奇说：“你有什么了不起，我动一个小指头就可以把你打倒！”但事实上，眼下毛要打倒刘少奇并不那么轻而易举。他还真有点扳不动刘呢。

毛发出宣战的信号：上井冈山。六年前，当彭德怀起来反对他的政策时，毛曾威胁说：要是人们不跟他走，他就“上山打游击”。他这次真上山了，警告声分外响亮：我不是说说了事，说到做到！

毛从来出行都是说走就走，这次不一样，上井冈山“酝酿”了好久，同事们都通知到了。蹲式马桶准备好了，派人沿途走了一遍，途中的“阶级敌人”关的关，送走的送走。

上路后，毛的座车预备了两套，以转移视线。随行的中央警卫团官兵身着便衣，像好莱坞电影里的帮会打手一样，把枪支藏在乐器盒子里。

毛一九六五年二月底离开北京。他走走停停，观察刘少奇等的反应。四月九日在武汉时，消息传来，跟他最亲近的上海第一把手柯庆施，患胰腺炎被误诊，在四川成都死去。六十三岁的柯，偏偏在这个时刻死于医疗事故，不由毛不顿生疑窦。他在武汉住了下来，四月二十二日，把老搭档林彪召来单独长谈，交了打倒刘少奇的底。毛要林把军队牢牢掌握住，不要让在中央主事的刘插进手去。

五月十九日，刘少奇接见在北京召开的军委作战会议成员。林彪本来说身体不好不去参加接见，但临时忽然出现。会见结束，刘宣布散会时，林站起来说他还有话要讲。他批驳国家主席已经认可的与会者的发言，表明他才是他们的领导，刘少奇的话不算数。

有林彪在北京盯住刘，毛放心地于五月二十一日开始上井冈山。毛在山上住了七天，哪里也没去，就在宾馆的附近散散步。本来他打算去从前住过的八角楼看看，正迈脚出车时，猛然听见有响声。这是遥远的山坡上采石工人在砸铁钎，但山里声音传得远。毛马上把已踏在地上的一只脚缩回车里，要司机即刻开走。

直到临离开井冈山前几分钟，毛才接见了一些当地人。他们被组织起来在宾馆外向毛欢呼，看着毛登车离去，到这时他们才知道毛在山上。从毛到来，到他走后相当一段时间里，井冈山与外界的联系和交通全部中断。

毛住的宾馆是大跃进中为他修的，可毛不满意。他走后又动工照他通常的标准重建了一座别墅。只是毛再没回来过。毛在井冈山上时，刘少奇在北京努力加强自己的形象塑造。五月二十七日，《人民日报》头版出现了一篇文章，用的完全是“个人崇拜”的语言和口气：

山格外的青，水分外的绿……十三陵水库的景色，呈现出从来没有过的壮丽。

下午三点多钟，两辆汽车在水库的西南岸停了下来。从车上步下两位身材魁梧、和蔼可亲的人，迈着稳健的步伐，向水边走去。

正在水库里游泳的首都高等院校学生和解放军战士，远远就认出这是我们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和刘主席，人群中立刻响起一片欢呼声：

“毛主席来游泳啦！”

“刘主席来游泳啦！”；

青年们看到毛主席和刘主席红光满面，精神焕发，只觉得一股幸福的暖流传遍全身。

毛主席和刘主席拨开万顷碧波，肩并肩地向前游进。

游泳的事发生在一年前的六月十六日，不是什么新闻。这时突如其来把它作为特写发表在头版，显然是有意安排为刘作宣传，选择的时机是毛远在井冈山上，《人民日报》负责人可以推说无法请毛过目。后来这些负责人在文革中部被整得死去活来。

回北京之后，毛没有立即对刘少奇采取行动。他很可能是想等第二次亚非会议开完后再动作。会议定于六月在阿尔及利亚召开，刘少奇作为国家主席同很多亚非国家元首打过交道，在会议前夕清洗刘会给毛造成不良影响。毛对这次会议寄予了无限希望，打算通过它进一步确立自己在发展中国家的领袖地位。他派周恩来去完成这个任务。

第一次亚非会议十年前在印尼的万隆举行。那次周恩来在新独立的发展中国家的领导人中留下了良好印象。自那以来，中国有了原子弹，毛泽东又不断慷慨撒钱收买人心。万隆会议的明星尼赫鲁已不在人世，毛唯一的担心是苏联参加，有苏联出场毛就唱不成主角了。中方花了大量精力游说发起国不邀请苏联。

印尼的苏加诺总统由于是万隆会议的东道主，有最后裁决谁被邀请的特权，毛不惜重金来笼络他，还提出派军队支援他打马来西亚。最使苏加诺倾心的是中国许诺为他训练制造原子弹的科学家。同样的许诺中国也对埃及等主要发展中国家做出。结果苏联未被邀请。其实毛无意与他人分享核技术，后来埃及总统纳赛尔要求周恩来履行诺言时，周叫他“自力更生”。

正是为了给毛“拉选票”，中国撒出了一笔巨款：修长达两千公里的坦赞铁路。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为修建这条从内陆的坦桑尼亚经赞比亚（Zambia）通印度洋的铁路寻求资助，被西方拒绝。中方得知后说：“毛主席说了，帝国主义不干的事，我们干，我们帮助你们修。”这条铁路到底有多用处，毛是不关心的。其实连尼雷尔本人对该不该修也犹豫不决，哪怕铁路由中国白送，钱、材料、人力都是中国出。周恩来还得说服尼雷尔，居然谎称中国修铁路的材料、人员都有余裕，如果不修坦赞铁路也就浪费了。这项工程耗费了中国十亿美金。毛轻飘飘地说：“没有什么了不起嘛。”

第二次亚非会议开幕前十天，东道国阿尔及利亚发生军事政变，本·贝拉（Ahmed Ben Bella）总统下台。毛曾竭力拉拢本·贝拉，嫌外交部写给本·贝拉的信“打官腔”，亲自动笔，称本·贝拉是“亲爱的兄弟”“我希望看到你。全中国人民准备热烈欢迎你。”本·贝拉一倒台，毛立马翻脸不认人，要周恩来宣布支持新领导人布迈丁（Houari Boumedienne），按原计划开会。

绝大部分亚非国家都不想此时去阿尔及利亚开会。中国外交官们四下活动，拚命想说服他们去，到处碰壁。尼雷尔总统坦率地对中国外交官说：周恩来总理是我最敬佩的政治家，但我很不理解周总理为何坚持如期在阿开会。本·贝拉是非洲公认的反帝、反殖斗争的英雄。他的被捕，无论从理智上或感情上，我都不能接受。尼雷尔说：中国政府的坚决态度和中国所进行的积极活动，超过了布迈丁政权，这已引起一些人的惊奇、怀疑，甚至不满，有损于中国和周总理本人的崇高声誉。

会议延期了。在对中国怀疑日盛的情绪下，埃及等国提出邀请苏联参加。毛当不了老大了，中国转而宣布不参加。第二次亚非会议没开成。

毛又气又急。他迫切希望能来点成功，以平衡挫折。正好这时印巴战争爆发。三年前，毛曾痛快淋漓地打败了印度，这次他想跟巴基斯坦左右夹攻印度，再来一场胜仗。巴基斯坦跟中国相当接近，是得到中国援助最多的非共产党国家之一。

毛把部队调到边界，发了两份最后通牒式的照会，限令印度政府在九月二十二日午夜前，拆除所有“侵略工事”。印度的答覆是和解的，说，虽然印度政府深信它的军队没有在西藏境内修筑工事，它愿意“进行一次联合调查”，如果有，“不会反对拆毁它们。”中方的答覆是：“没有必要进行调查”，“印度方面确实有侵略工事设在中国境内”。毛把中国拉到战争边缘。

就在中方限期到的前一天，巴基斯坦接受了联合国要印巴双方停火的决议，告诉毛，不停火无论外交上还是经济上代价都太大。毛极力劝他们打下去，可巴基斯坦不愿打。无奈之余，毛只好放弃了打印度的念头。没有巴基斯坦配合，毛难有把握单独取胜。上一次打败印度得益于出其不意，如今印度有了准备。为了体面地下台阶，中方宣布“印军偷偷摸摸平毁侵略工事狼狽逃窜”——其实印度什么也没做。

在急于成功的心态下，毛到处发动“武装斗争”。在泰国，他培植起来的、以华侨为主的共产党，在八月七日首次与政府军交火。这一天从此被称为“开火日”，以失败告终。

最大的惨败发生在印尼。当时印尼共产党有三百五十万人，在非共产党国家中人数最多。斯大林把它划归毛管。日本共产党总书记宫本显治对我们说，中共一直在鼓励印尼共和日共：“只要有夺权的机会，就奋起以武装斗争夺权。”宫本与艾地曾在一九六四年讨论过这个问题。日共的态度是谨慎，而艾地却信心十足，觉得只要毛看准了就有把握成功。

亚非会议坍台后，八月，毛告诉印尼共夺权的时机到了。中方对艾地说，给亲华亲共的苏加诺总统看病的中国医生，诊断出总统的肾脏有严重问题，将不久于人世，机不可失，时不可待。印尼共的夺权是夺军权。苏加诺总统不掌握军队，军队高层强烈反共。中国曾不断敦促苏加诺把军队拿过来，在苏加诺协助下，印尼共加紧渗透军队，以致过于乐观地相信它能秘密掌握陆军的一半、空军的三分之二、海军的三分之一。印尼共的夺权计划是：把反共的军队首领抓起来杀掉，然后苏加诺出面接管军队，一九六三年九月，周恩来把印尼共领袖艾地召到广东温泉城市从化，与胡志明和老挝共产党负责人会晤，在战略上把印尼和印度支那联系起来。军队里的共产党人则保证部队服从命令。九月三十日，苏加诺总统警卫部队营长翁东（Untung）中校率人逮捕处死了印尼陆军司令和其他五个主要将领。毛在跟宫本显治的谈话中把这一事件称为“印尼共产党的武装起义”。可是，一个未曾预料到的变故使全盘计划土崩瓦解。密谋者中有一人偷偷把“九·三〇”行动计划通知了陆军将领苏哈托（Suharto）。苏哈托本人不在处决的名单上，他做好准备，等逮捕处死完毕后，立即出面控制军队，在全国掀起血腥大屠杀，直杀了数十万共产党人、同情者和无辜平民。印尼共产党领导人几乎被一网打尽，上了断头台，只有一名政治局委员逃脱，尤索夫，阿吉托若夫（Jusuf Adjiorop），他当时在中国。三十年后他仍然在那里，我们见到他时，他已是一位灰心失望的老人。

苏加诺总统被迫让位。苏哈托将军建立起一个反华、反共、迫害华侨的军事独裁政权。毛泽东把一败涂地的责任推在印尼共头上。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我们提供了毛同日共领导人的谈话记录，毛说：“印尼共产党犯了两个错误。第一，他们盲目相信苏加诺，过高估计了党在军队里的力量。第二，他们动摇了，没有打到底。”其实，印尼共根本没有还手之力。苏哈托的大屠杀其残暴，其凶猛，其迅雷不及掩耳，是中共在蒋介石手里从来没有经历过的。跟苏哈托比起来，蒋介石对中共简直可以算得上“仁慈”。

一九六五年快要过去了，毛泽东在全球是失败连连。满腹挫折感的他，掉转头向国内的政敌猛扑过来。

□ 摘自张戎：《毛泽东一鲜为人知的故事》

~~~~~

【春秋史笔】

毛泽东的个性特征与理想实质



• 周伦佐 •

毛泽东逝世三十一年来，民间心理对他的态度发生着显著变化：1976至1980年——否定为主，整个80年代——毁誉参半，1990年代以来——肯定增加。尽管肯定之声多数来自不满社会现状的弱势群体，但也表明毛泽东形象的多面性。其中最具欺骗性的一面，自然要数他身上所谓的“人格魅力”和“平等理想”。为了看清毛泽东这一面的狰狞性质，有必要从理论上还原他的真实面目。在世人眼中，毛泽东仿佛是个谜。这个谜主要产生于他成为一代开国帝王之后的所做所为。他那谜一般的作为，在他人生的最后十年更是达到登峰造极。的确，他晚年的作为充满了令人费解的矛盾性，太多离奇、太多歧义。李泽厚这样论说晚年毛泽东的复杂性：既有追求新人新世界的理想主义一面，又有重新分配权力的政治斗争一面；既有憎恶和希望粉碎官僚机器的一面，又有怀疑“大权旁落”有人篡权的一面；既有追求永葆革命热情和奋斗精神的一面，又有渴望做世界革命的导师和领袖一面。二者是混在一起的。

人们亲眼看到和亲身感受到的毛泽东的复杂性，比这还要多。例如：他是一个知识分子和古体诗人，同时又对一切近现代性的人文知识分子和人文知识深怀敌意；他出身农民家庭而且时常为农民的疾苦落泪，同时又不惜采取一系列强制措施无情剥夺农民的衣食条件，直到饿死几千万父老乡亲后，还要为了维护自己的面子而固执己见嫁祸于人；他是性情中人，憎恶官僚作风、厌恶等级划分，对身边的战士和远方的老表亲如家人，同时又发动一个个诸如“反右派”、“反右倾”之类的整人运动，置千百万无辜者于死命；他生活简朴，宁肯自家孩子无肉吃也不肯享受特殊，同时又金口大张，慷慨免去日本应付给中国的巨额战争赔款；他提倡说真话反对弄虚作假，同时又支持官方文字和新闻媒体，在国内外一切重大事件的宣传上歪曲真相愚弄百姓；他强调个性、主张自由，同时又亲手建立起古往今来空前绝后的极权体制；他发动“文革”，鼓励广大青年造反，将矛头指向各级官僚和各种权威，为青年人提供表现个性、挥发激情、肯定自我的机会，同时又建立起一种更加专制独裁的社会秩序，完全抹杀个人地位和个人价值，彻底取消个人自由和个人权利。

看起来毛泽东确实是个令人费解的矛盾人物。难怪有那么多研究者的思绪在他身上绕来绕去也理不出个头绪，难怪有那么多探索者的目光在他面前高山仰止望而却步。

毛泽东真的复杂得无法深究和矛盾得不可思议吗？

其实，毛泽东自1957年以来特别是“文革”中的所作所为并不矛盾，其个性行为与社会理想历来浑然一体。人们之所以被他的矛盾性和复杂性所迷惑，只是因为没能认清其个性行为的特征和社会理想的实质，并将二者结合起来统一看待。

#### ◇ 毛泽东的非制度化个性行为

国外研究者已有人通过对毛泽东与刘少奇性格、气质的对比，触及到了毛泽东的个性特征问题。他们认为：毛泽东感情冲动，性格奔放；刘少奇谨小慎微，一丝不苟。毛泽东的行为方式是个人性、最高元首式的，他善于启发和鼓动群众，直接与群众沟通；刘少奇善于组织操纵，依靠庞大的体制化机器。

所触及毛泽东的个性特征十分粗浅，倒是对刘少奇的概括比较准确而且颇具启发性。与刘少奇相反的毛泽东的主要个性特征，不就是非组织化、非体制化吗？是的，这正是毛泽东个性的主要特征，不过我宁肯称之为非制度化个性。按我的理解，制度化与非制度化，本是每个人一生中的两种个性倾向。强烈的非制度化倾向尤为青春期的年轻人所共有。此时的青年人，大多有强烈的自我肯定倾向和自我表现欲望，怀疑与创造并飞，叛逆和追求共舞，个性锋芒直指

旧的权威和旧的束缚。心理学所称“人生的反叛时期”和“青春期的叛逆”、文学史所说“狂飙时代”和“叛逆时代”，即指青年个体和青春群体特有的非制度化倾向。人们所熟悉的“青春期叛逆心理”，往往外化为青年人的非制度化个性表现。人在青春期的非制度化倾向，由青春期的心理特征所规定。这是生命里程由未成年人向成年人转变的紧要时期，人生急待完成来到世间后的第二次断乳和第二次站立。同样是要改换食品并摆脱搀扶，但不再像第一次断乳和站立那样是物质性的，而是变成了精神性的。这之前，精神生活无不依傍于家庭和学校的严密监护，精神之乳是其灌输的行为准则和知识谱系，人的精神个性完全不能站立。此时面临要以成年人的身份独立步入社会，他们必须断弃无选择强加的精神炼乳而自行选择适用的精神食粮，他们必须放弃过去的精神依傍而另寻今后的精神依傍。这是一个放弃和选择共存的时期，这是一个断裂和链接同在的时期，既反对依傍又需要依傍，既反对权威又需要权威，既反对偶像又需要偶像。人在心理层面处于从未有过的怀疑、对抗、寻觅、迷惘之中。个人性的青春期非制度化倾向，一般只局限于家庭范围——以父母所代表的权威存在和制度约束为反叛对象。现代社会通过学校实施的同化教育，会将超出家庭范围的青春期非制度化倾向稀释殆尽。在这个范围内，“反叛家庭”——便成为青春期最突出的口号和最显著的现象。这很常见。罕见的是群体性的青春期非制度化表现。因为这需要历史机遇及其所搭建的社会舞台。外敌入侵、政权更迭、社会转型、高层争斗……都属于这类机遇。这时社会急剧动荡，秩序全面紊乱，人心极度不安，统治权力失控或者削弱，不确定因素空前增多。广大青年敏锐地感觉到社会性动变的讯息并迅速作出行动的抉择。青年群体的聚集场所——城市中的校园，自然成为群体性青春期非制度化行为的主要策源地。

制度化与非制度化，既是人一生中的两种个性倾向，又是人群中的两种个性类型。少数人身上的非制度化个性特征，如同这些人终生保留着青春期的叛逆倾向。

如果不从这个角度来观察，“文革”中青年学生的反常造反和毛泽东的异常举措，定将令人费解。只有从这个角度去看，文革中广大青年反权威、反束缚的集体行动和毛泽东反潮流、无法无天的个性特征，便可解释；毛泽东与广大青年之间的行为契合就可理解。

个人的活动从来就展开于群体生活形成的各种制度中，无不受着群体组织的纳构和群体规范的约束；而个人的自主地位和自主要求又具有一种摆脱群体纳构和群体约束的趋向。于是，人生便有了制度化个性倾向时期和非制度化个性倾向时期，人群中也就有了制度化个性类型和非制度化个性类型。非制度化个性倾向时期和非制度化个性类型，由于可能充分展现个人凌驾于群体组织和规范之上的主体性及其非凡的生命力和创造力，而对普通个人具有巨大的感召力和亲和性，所以显示出超凡的魅力。这种个性光芒，当然只为人生中短暂的青春叛逆期和人群中少数的离经叛道者所独有。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命个性。人群中个体的生命个性千差万别，社会心理学和个性心理学做了各自的分类，但我认为还可从社会学角度划分出制度化个性与非制度化个性两大类型。前者为遵从型，后者为反遵从型。制度化个性：习惯于对群体组织及其行为准则的依附、认同、服从。非制度外个性则相反：喜欢支配人而非遵令行事，喜欢建立团体而非隶属其下，喜欢制定行为规则而非受其束缚。非制度化个性在普通人中并不罕见，例如历朝历代的那些反叛者首领，现实生活中那些反社会行为的带头人，以及古往今来的异端思想者和先锋艺术家。罕见的是政治人物当中的领袖——如果他在推翻了旧制度之后本性难移，势必回过头来反对对自己亲手建立起的新制度，造成自己事业的断裂和形象的分裂。毛泽东恰好就是这样一位政治领袖。

一个人生命个性的形成，首先取决于生理遗传和心理素质，其次取决于家庭出身和少年经历，最后取决于青年时期所接受的社会环境刺激和人文知识影响。后者同样重要：因为这是一个人确立人生观从而实现精神上站立的关键时期，他一旦形成自己特有的站立姿势，就会迈动相应的步伐走下去，直到人生的终点。

关于构成人们个性特征的生理遗传和心理素质，我们无法探究。只知道毛泽东自小便具有极强的反遵从秉性，内心充满超凡的自信。下层家庭出身和贫困环境磨砺，只会激发起他对现实的反叛倾向和对权威的逆反心理。在长期的斗争生涯中，一次次与共产国际反道而行并与留学回国的洋秀才们大唱反调却无往不胜的经历，更加强了他对自己反权威心理和逆向行事秉性的自信。“文革”中他提倡的“反潮流”精神，其实就是对自己个性特征的总结性注解。这使得他在确立人生观时期，更倾向于摄取与自己个性特征相适应的知识要素。李泽厚认为，成为青年毛泽东人生观构成要素的人文知识，主要有四个方面：主张自我实现、意志自由的个体主义，主张英勇无畏、舍生成仁的英雄主义，主张反对一切权威、反对一切束缚的无政府主义，主张经世致用、知行合一的实践主义。资本主义的经济学原理、法学理论、教育体制、政治制度和文学艺术，似乎对毛泽东没有任何影响。马克思主义也只是在他确立了自己的人生观之后所接受的一种实用社会理想，对他人生观的形成并无太大意义。

这大体成立。毛泽东留存于世的几十首艺术水准参差不齐的古体诗词，无不闪现着作者的非制度化个性特征。从青年时代一介布衣时的“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到中年时代成为共产党领袖后的“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两首词之间隔着漫长的岁月，但其中的个人主义、英雄主义、反权威主义一脉相承，没有因为作者身份和地位的改变而中断。1971年，毛泽东在与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谈话时，曾把自己的个性特征形容为“无法无天”。“无法”即是非制度，“无天”即是反权威，将毛氏的非制度化个性特征概括无遗。

在政治领袖范畴，非制度化个性者与制度化个性者之间的对比异常分明：

前者在认识上依赖个人直觉，在管理上相信人治，在行为上倾向于非组织化手段；后者在认识上依赖集体决议，在管理上相信法治，在行为上倾向于组织化程序。中国近代史上几个重要政治领袖的个性特征，可以划归制度化类型的有孙中山、刘少奇、周恩来和邓小平；可以划归非制度化类型的是蒋介石和毛泽东。考察他们确立人生观时代所接受的政治文化影响，有一个现象令人称奇：孙中山、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都在西方留学多年，多少受过西方政治文化的熏陶；蒋介石、毛泽东一直呆在国内，接受的主要是东方政治文化的影响。虽然刘少奇留学是在苏联，但苏联处在西方政治文化传统范围。蒋介石虽然到过日本留学，但东方政治文化传统范围包括了日本。这绝非偶然。西方政治文化传统的平等主义、分权主义，更适合制度化个性者的天性；东方政治文化传统的等级主义、集权主义，更宜于非制度化个性者的操作。这两种人对政治思想资源的选择必然不同。西方社会心理学为我们打开同样的视野：我们这个世界上活动着的人类群体，可以分为集中化群体和非集中化群体两种类型，并从中产生出个性迥异的专制型领袖和民主型领袖。集中化群体信奉为了少数人自由而限制大多数人自由的等级主义，所以容易接纳绝对自信而绝少遵从性的专制型领袖；非集中化群体信奉为了大多数人自由而限制少数人自由的平等主义，所以容易接纳不很自信而具有遵从性的民主型领袖。对应于中华民族这个集中化群体及其所信奉的等级主义传统，蒋介石和毛泽东无疑是两个绝对自信而绝少遵从性的专制型领袖。

难怪蒋介石继承了孙中山所建立西方式的民主政体，但在大陆和台湾仍然习惯于实行东方个人独裁式的专制统治。难怪毛泽东喜欢以内行的身份抓管文学艺术，但他的文艺爱好其实只限于中国古典小说、古典戏曲和古典诗词，对近代以来东西方人本主义向度的文学艺术完全拒绝和一概排斥。

东方政治文化传统从夏朝始，就重个人直觉、重人治、重非组织化手段；西方政治文化传统从古希腊始，就重集体决议、重法治、重组织化程序。在古罗马，早在公元前44年，就有

了元老院集体决议处死凯撒大帝的制度化先例，在中国，人们从来看到的只是皇权至高无上的非制度化惯例。这正是东西方政治文化传统的本质差异。专制——东方政治文化传统的本质特征。民主——西方政治文化传统的本质特征。非制度化个性类型的政治领袖，天然亲近于东方式的政治文化，因为独裁理念可以让他不受任何约束地独断专行、自行其是又不担责任。对制度化个性类型的政治领袖来说，西方式的政治文化更具吸引力，他更倾向于在组织程序的约束下，依靠集体的智慧和力量来谨慎行事并分担责任。当非制度化个性的领袖执掌民主政体时，民主也会变得非常专横，比如蒋介石之于大陆和台湾。当制度化个性的领袖执掌专制政体时，专制也会变得比较温和，比如邓小平之于大陆。但是两种政体所属政治文化传统的本质特征，不会因领袖的个性特征而改变。政治文化传统的本质大于政治领袖的个性，改变的只是局部和暂时，本质难以改变。

毛泽东对于大陆的严重性在于：他接受的政治文化影响、建立的政体都是专制类型，又与本人的非制度化个性结为一体。

将毛泽东的非制度化个性作风定性为“封建专制主义”，似乎是囿于马克思社会历史“五形态说”得出的陈旧结论。事实上，独裁和专制并非封建政治的专利，而是东方政治文化传统的特产；实行独裁和专制统治的也并非只有封建君主，而是包括封建君主在内一切具有非制度化个性特征的政治领袖。

有的西方学者试图用韦伯的概念将毛泽东归为“超凡魅力型领袖”。其实这种超凡的魅力，只是毛泽东个性的魅力而非思想的魅力。这种魅力，凡属非制度化个性类型的政治领袖、反叛首领、异端思想者和先锋艺术家皆有，并非政治领袖的专利。只是各自的发挥范围和影响强度不同罢了。

#### ◇ 毛泽东的反历史社会理想

毛泽东的社会理想，常常被某些研究者从“社会平等”、“中国道路”、“民族话语”……角度进行打量。怎样评判其社会理想的实质，早已成了一个超越政治的学术问题。

毛泽东的确是个理想主义者，这没错。但是我们不能不剖析其理想的实质，仅仅凭着“理想”一词的褒义性，就赋予他诗意化和浪漫式的评价色彩。毛泽东的社会理想是什么呢？是在中国建立一个纯“无产阶级化”的美好社会。无须多思索，人们很容易从他1957年至1976年发表过的讲话、制定过的路线和政策、实际开展过的各种运动中，找到这个无可置疑的结论。这个社会理想来自马克思主义。没有剥削和压迫，没有私有财产和私有观念；没有分工和差别，没有商品交换和货币流通；没有贫富悬殊、社会不公、尔虞我诈、私心私欲；个人全面发展，人人五业精通；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这幅展现在平等主义画板上的社会图景确实美好。从毛泽东非制度化个性的行为逻辑推论，他之所以在1957年突然推倒《新民主主义论》的全部设计，转而要实现纯粹“无产阶级化”的理想，显然与斯大林断然否认新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和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政党的傲慢态度有关。心理逆反，意志逆行，你越是否认，我越要创造出令你叹服的人间奇迹来。毛泽东是如何把中国向这个理想社会推进的呢？我们看到一组抽象而又具体的历史镜头：刚迈入“新民主主义”，完成工业、农业、手工业、私营工商业的“一化三改造”，就立即凭空跃向“社会主义”。在政治、文艺、教育、科技领域，开展“反对资产阶级右派”运动，扫除五十多万挡道知识分子。农村经济组织实行“三级跳”——“互助组”、“合作社”、“人民公社”，刚分到农民手中的土地很快又全部收归“国有”。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高高飘扬——全民大炼钢铁、大垦荒、大放高产卫星、大办公食堂。十五年超过英国赶上美国，共产主义早实现。客观规律被主观愿望代替，个体生产方式被集体生产方式代替，小家庭被大家庭代替，现实被梦想代替。在党内开展“反对右倾

机会主义”运动，清除一大批党内反对者。经济大崩溃，三年大饥荒，饿死几千万人，六亿中国人在奔向理想王国的道路上饿得奄奄一息。面对1960—1962年的大悲剧结局，编造了“自然灾害”和“苏修逼债”两个理由就轻轻搪塞过去。总导演毛泽东退居二线，把刘少奇推到一线收拾残局。经济刚复苏，肚子刚填饱，神经刚放松，另一组仍由毛泽东导演的镜头早已切入历史的画面：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使全国上下的神经再度绷紧。开展对文艺界“写真实论”、“写中间人物论”等所谓“资产阶级‘黑八论’”的批判，范围涉及文、史、哲、经的“文化批判”，初具模型。经济领域刚刚萌发的“三自一包”、“四大自由”遭到扼杀。推出“大公无私”的新人典型雷锋，旨在塑造新人样板的“样板戏”在紧锣密鼓声中拉开序幕。矛头指向基层“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四清运动”全面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爆发。这些用紧缩式的政治名词来指称的历史事件，无不包含着一个共同的内容指向：使中国全面“无产阶级化”。毛泽东用以实行这种不变指向的非制度化个性行为也愈演愈烈，直到一手遮天发动“文革”——这场全面“无产阶级化”的大进军。

关于毛泽东社会理想的实质，人们习惯于将其定位为“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小农平均主义”，并定义为脱离客观现实的主观空想。

不错，毛泽东在顽强推行其社会理想的进程中，始终伴随着与社会现实的严重脱离和激烈冲突：明明是一个农民领袖领导的农民政党领导的农民国家，硬要使之完全同化于比重极小的大工业和仅有三百多万人口的产业工人，能不脱离并冲突吗？明明全国的基本生产工具还是榔头、锄头加犁头，硬要搞社会化大生产式的组织形式，能不脱离并冲突吗？明明经济实力、技术水平、管理素质只有那么一丁点，硬要一日千里大跃进，能不脱离并冲突吗？明明城市与乡村、工业与农业、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之间差别那么大，硬要消灭分工、取消商品交换、限制“资产阶级法权”，能不脱离并冲突吗？明明百分之九十的人口还是文盲和半文盲，硬要消除思想差异让亿万人都成为大公无私的“社会主义新人”，能不脱离并冲突吗？如果毛泽东社会理想的实质可以据此定义为脱离社会现实的空想，问题就十分简单了。因为即使这个空想破灭，也是毛泽东的精神世界太超前的结果，他仍然是一代伟人而且充满善意，就算失败了也是英雄式的失败，他依然是个思想超前而魅力无穷的英雄。硬要责怪的话，只能说 he 脱离了眼前的现实，他的主观愿望和客观努力毕竟是想带领中国人民推动中国社会向前跃进。

毛泽东的社会理想，是否属于充满良好愿望的超前空想呢？要想真正认清其本质，就不能囿于其话语系统设定的理论范畴，而必须放眼于在其话语之外真实存在着的现实需要和历史趋势。毛泽东的社会理想，是一个由正向肯定面和反向否定面相互依存而形成的理念结构：正向肯定面——指明肯定什么、坚持什么、追求什么；反向否定面——指明否定什么、反对什么、防止什么。在这个维度上，其社会理想的双面指向非常明确。借用其话语系统中人人熟知的专用政治名词来代指，我们会看得非常清楚：他在理想的正向所肯定、坚持和追求的，是“公”、“无产阶级化”、“社会主义”；他在理想的反向所否定、反对、防止的，是“私”、“资产阶级化”、“资本主义”。可以简缩为四个字：“兴无灭资”。如果不顾历史和现实的双重抗议，仍然按照其话语系统中关于进步与倒退、先进与落后、革命与反动的价值坐标来看待其社会理想的实质，我们定会作出同样的评价：无论它怎样不切实际和如何空想，它还是进步的先进的革命的。当我们走出其话语系统，倾听历史和现实在人民心中提出的要求，便不能不得出相反的结论。从封建社会挣扎而出的现代社会的根本要义是什么？是确立个人在经济、政治、文化上的自主权利。即使毛泽东站在刚从封建社会走出的中国大地上搬用马克思从资本主义社会高度发展状态中得出的社会主义结论，个人在经济、政治、文化上的自主权利仍然是其中不可抽去的核心。就算中国这样的后发展国家，在开始现代变革之时，因面临西方列强的威胁，不能不将确立个体权利的进程移后而先行解决民族救亡问题。如今中华民族已经站起来，确立个体权利，能不再度呈现为历史的首要任务吗？由此不难看出毛泽东后半生社会理想及其政治实践的实指。从“一化三改造”、农业合作化“三级跳”、“三面红旗”，到“文革”中批判“三自一包”、“四大

自由”和“割资本主义尾巴”、“拆资产阶级土围子”，毛泽东在经济领域的双面作为究竟指向什么？一言以蔽之：在“一大二公”的名义下，剥夺人民经济上的一切私有权利。剥夺行为逐渐加剧，直到“文革”中达到极致，不仅个人财产私有、个人生产要素使用权、个人生产经营自主权丧失殆尽，就连个人最原始最起码的家庭权和果腹权都难以保障。在文化领域，伴随无休止的“思想改造”和“文化批判”所进行的“破私立公”，完全消解个人思想自由的权利以及对自身权利意识和知觉。剥夺式干预甚至深入到了个人书信、日记、梦境中的隐私权领地，将数亿中国人强塑成一大群因丧失主体意识和自主觉悟而人格扭曲的畸形人。“批判资产阶级文化”是其反向否定面的主要内容。所批“资产阶级文化”究竟是什么？是西方16世纪“文艺复兴”运动以来所奠立以肯定、唤醒和解放人为主题的近现代文化，除了政治意识形态部分勉强可以贴上“资产阶级”的可笑政治标签外，其他内容都是属于全人类的先进文化成果。可以说，“文革”前十七年中国人精神生活中仅存的一小点人性照明和人道关怀，就是来自这些以各种符号形式存现于世界经典和“五四”名著中的近现代文化。“文革”的大火焚烧和全面禁读，完全暴露了十七年来“批判资产阶级文化”的险恶意图：防止人们从这些书籍中获得任何关于自主地位和自主权利的激发式信息。毛泽东在其正向肯定面所建立的“无产阶级文化”又是什么内容呢？核心自然是“大公无私”。典型的现实体现者之一当属雷锋。如今说起这个人，人们最敬佩的还是他那助人为乐的崇高品德。可毛泽东感兴趣的恐怕更是他的无私无欲。说来可笑，在当初风靡全国的《雷锋日记》中，雷锋完全是一个全心全意忠于领袖、彻头彻尾服从领导、绝无一点私欲的“新人”；“文革”中却发现《日记》中被删除了反对“走资派”的内容；“文革”后更报道他也有七情六欲而且恋爱过。在上个世纪60年代，毛泽东理想中的“新人”究竟是哪一个雷锋呢？显然是第一个。大公无私型新人的艺术体现者自然是“样板戏”人物。

这是一些什么样的新人样板呢？只有革命热忱和献身精神而绝无属于个人的七情六欲。女的不能有丈夫，男的不能有妻子，双方更不能有儿女。《红灯记》中有个三代人的家庭，但也必须不同姓：阶级亲高于血缘亲，阶级组合大于亲情组合。古人云“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毛泽东偏要反其道而行之：自己根除不了七情六欲，硬要中国老百姓根除，还美其名曰：大公无私。要人民大众用无私来成全一己之私，奉一己之私为公而让天下认同，这才是文化领域和人心深处“破私立公”的真义。伴随着经济权利和文化权利的剥夺，个人政治权利遭受的剥夺更为彻底。在“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和“加强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的双向口号下，“人民当家作主”成为一句空话。个人的选举权与被选举权早被当事人视为下流的把戏。结社自由、集会自由、游行自由、示威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新闻自由的宪法条文，更成了一把把令人望而生畏的利剑，谁敢自触锋芒血溅三尺？人道、人性、人权、博爱、平等、民主、自由、真、善、美这类光辉的人文价值词，变成了叫人害怕的黑字。获罪的机会太多：说错一句话，做错一件事，唱错一首歌，认错一行字，甚至心里所想和梦中所为……更不用说什么不同政见和反对主张了。当刘少奇“文革”初期认为自己这个经全国人民选举出来的国家主席未经全国人民批准就被打倒是违反宪法时，他完全忘记了全国人民从未选举过他，选举他的只有毛泽东一人而已。毛既然有权选举你，自然就有权罢免你。一人之下的刘少奇尚且如此，广大百姓夫复何言？所谓“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实质是加强一个人的专制；所谓“加强对资产阶级专政”，实质是加强对广大民众自主意识和不满情绪的镇压。在这里，“无产阶级”纯粹是一个虚指性的假借名词，它的真实所指，并非那个在中国从来就没有执政能力也没有任何政治权力的工人团体，而是毛泽东所领导拥有中国全部资产的政治集团。假借“无产阶级”之名加强个人威权的合法性，不正是双向专政的实质吗？毛泽东社会理想在经济、文化、政治上的双面指向，尽管打着“公与私”、“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这样三对话语幌子，但彻底剥夺个人一切权利的根本性质，仍然是至少八亿中国人亲身经历的铁证事实。为了让毛泽东社会理想的实质更加通俗易懂，不妨分析一下他那些“批判修正主义”和“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举措的真实含义。

这里所说的“修正”、“复辟”，是指上世纪50年代发生在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

政治事件。它们包括1956年2月苏联“非斯大林运动”，1956年6月波兰“波兹南事件”，1956年10月“匈牙利事件”。这些事件有两个共同的特点：第一，都主张改变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体制，以民主代替专制；第二，都有执政党内持改革态度的高层人士参与。毛泽东密切注视着这些事件的发生，并且感受到了巨大的冲击。自此，在其社会理想结构的否定对象中重点加进了“修正主义”，防止来自党内的“资本主义复辟”和“防修反修”，成了他重点思考的新课题。国内1957年的“反右”运动，1959年的“反右倾”运动，1962—1965年对文艺问题的一系列批示和“文化批判”运动，1964—1966年的“四清”运动，都是在这个思路展开的。1966—1976年以“斗私批修”为基本内容、被称为“反修防修大演习”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更是这个思路完全成熟的最高标志。关于“反右”运动的起因，人们大多认为是毛泽东先有预谋然后引蛇出洞一网打尽。原中央文革小组重要成员戚本禹，以知情人的身份谈了自己的不同看法——他认为“毛泽东发动反右派斗争的原因”，是“担心在中国发生匈牙利事件”。

他的看法比较客观。可以说，毛泽东“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和“反修防修”的思想种子，就是这时播下的。现在谈到1964年6月27日毛泽东关于文艺问题的批示时，人们很少注意两个警告性提法的核心意指。一是“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二是“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是“匈牙利事件”中该国民主知识分子的聚会中心；“跌到修正主义的边缘”显然指逼近“复辟”地带。这表明：即使对小小文艺问题，毛泽东也是怀着担心发生“匈牙利事件”和“非斯大林运动”的高度警觉来看待的。联想到毛泽东在“文革”中打倒了刘少奇等一大批党内“修正主义头子”和“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后，仍然忧心忡忡地再三告诫“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并未消除，联想到1976年4月5日“天安门事件”后，《人民日报》那篇名为《天安门广场事件说明了什么》的社论将邓小平比喻为“匈牙利事件”中党内改革派领袖“纳吉”之事，我们不禁要追问：在“防止修正主义复辟”的虚假言词背后，毛泽东真正要防止的究竟是什么？答案非常明确：毛泽东所要防止的，正是1979年中国发生的体制内民主改革。这个改革的政治指向，同“非斯大林运动”和“匈牙利事件”一脉相承：对斯大林模式的官僚垄断体制和个人独裁统治进行修正，在“社会主义”框架内，还人民一定的民主，给个人一定的自由。这个天翻地覆的历史转变，在当年的苏联、波兰、匈牙利只有开始而无结局，在1979年以后的中国，却实实在在的有了结果。我相信毛泽东临终前在叶剑英耳边说的那句让人不知所云的话，应该是他生前的最后一件心事：防止……修正……复辟……。十分庆幸，毛泽东倾数十年之力想要防止的事变终于没能防住，他的社会理想终于被全面修正，人民被剥夺的权利终于开始复辟。站在今天望昨天。只要扪心承认毛泽东没能防止住的体制内改革更符合国情、民心和人性，我们就得承认：毛泽东社会理想结构的正向所坚持和追求的，其实是蒙上“无产阶级”言词假象的东方式个人独裁和封建性专制统治；其反向所防止和反对的，恰好是隐藏在“资本主义”言词假象之下的体制内民主改革和体制外民主革命。对于中国人民和中国历史来说，毛泽东社会理想的实质，绝非进步而是倒退，绝非先进而是落后，绝非革命而是反动！

遗憾的是，偏偏有那么一些不乏真知灼见的学者把毛泽东的社会理想奉为神圣。成都学者程世平在其力作《灵魂的需求》中，认为毛泽东社会理想的实质和鲁迅一样，是包括人心改造和文化批判在内的国民劣根性改造。作者认为：人心改造问题，在毛泽东那里不是认识上的困难，而是表述上的困难。因为改造对象是他的战友和人民，这使他陷入了两难境地，他真实的动机只好隐藏在为人们所接受的革命的、阶级的语词系统中，给人们理解他的思想设下了深深的陷阱。他的地位不容他自由发表一个思想家的见解，他思想家的本性不得不隐藏在政治家面貌背后。他的政治地位使他不得不艰难地表达自己的思想。他不得不为活跃的思想付出惊人的代价，甚至闯下弥天大祸。但不能因此而否定其思想的内在价值。毛泽东的错误，不在他的思想而在他的政治集团领袖地位。作者还引用英国历史哲学家汤因比的话说：“毛泽东比我们时代先进五十年。”

这种评价的谬误显而易见。我只想指明两点：第一，毛泽东与鲁迅毫无共同之处。鲁迅的人心改造，针对的是中国人意识中的保守、奴性、愚昧、麻木和萎靡。鲁迅文化批判所否定的对象，是愚人、蒙人和吃人的旧传统、旧礼教、旧道学。在进行人心改造和文化批判中，鲁迅使用的武器是西方近代以来的个体主义、民主思想和自由精神。毛泽东与鲁迅相反：他在人心改造中所针对的，正好是人们在西方近现代文化影响下对自身人格、个性、地位和权利的意识与要求。他在文化批判方面所否定的，恰好是世界和中国近代以来以人为主题的优秀文化，对法家之类的专制权谋，秦始皇之流的暴君典型，反而大肆宣扬。而且，毛泽东借以实行人心改造和文化批判的武器，也是完全取消个体存在的马克思主义和传统政治文化。毛泽东与鲁迅大相径庭。第二，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通读毛泽东著作，除了那些存现于政治性阶级性语词系统的思想，他还有得起只存乎于心的其他什么属于思想家的独立见解吗？他一生就思索和言说在这么一个话语空间，所有的思索和言说都超不出这个话语系统。何隐藏之有？无论从主观意图还是客观效果看，或者只看对社会道德和历史进程所起的客观作用，我们都可以认为：毛泽东的社会理想及其政治实践，完全是消极和负性的。他与所处时代的关系，不是先进了五十年，而是落后了五十年——完全退回到“五四”运动之前了。毛泽东作为一个思想家之所以显得高大，只是因为头上神圣的光环放大了他的形象。如今光环已经暗淡，不妨仔细观察。一流的军事家、二流的政治家、三流的古体诗人、四流的思想家——这就是毛泽东。不是故意贬低他，而是作为一个思想家，他本来就不高大。由此看来，毛泽东的所作所为其实并不矛盾。其非制度化个性行为与反历史社会理想，完全是统一的。

这种统一性在于：由于中共决策层制度化组织程序的制约，他只有以非制度化行为才能推行其反历史社会理想。其“矛盾性”中为人称道的一面，仅仅是其非制度化个性的魅力体现，令人憎恶的一面恰好是其反历史社会理想的荒唐实践。

2007年10月26日 写于古邛都森林居

## 【自由论坛】

### 对“贬周捧林”思潮的看法

· 李志宁 ·

当今，网上网下几乎是两重“思想天地”。所以，我知道，自己的感觉并不一定准确。到底哪一重天地更能代表多数中国人的意愿？我几乎无法断定。

但可以判断无误的是：在中国，人们对现实不满，已非常普遍，并愈益强烈。

目前在中国，极少数暴发的贪官污吏、及与贪官勾结在一起的劣商，滋润得如鱼得水，快活欲仙，只是或许有点担忧未来可能被人民“法办”，算是幸福生活中的小小斑点。除了他们，中国民众大都对于社会有种种不满，并且已经日趋愤慨，甚至愤怒。无论是下层的、或中层的，生活困难的、或有点钱的，赞美毛泽东时代的、或反对毛时代的，体力劳动者、或文化人……，几乎没人认为，当代中国是个公正的世界、是个能使人心灵宁静的美好天地。国内几乎多数人都非常浮躁，或抱怨自己没弄到钱，或者诅咒恶棍们却能花钱如流水。当代中国人的主要生活内容成了“算计”别人，发狂“竞争”。与50—60年代大不同，人们之间几乎只有利害关系，使人看了美国电视剧《Friends》之后，感叹不已。但同时，应当说，对现实不满的各式中国人，也都在寻找答案，寻找真谛，寻找自己的利益，也寻找自己的存在。互联网和西方的出版自由，则提供了这样一个场地，让各种人们的不同观点能够在其中表现自己，并以此感染别人，影响



大众。这是正常的。

《晚年周恩来》在国外出版，在海外华人中引起了轰动，以为揭示了中共的政治黑幕。其实，“文革”中争斗的政治上层活动，相对其他时期，还算是最容易为大众所感受到的。因为那时候各种“红卫兵小报”和小道消息满天飞，许多政治人物、当然包括周恩来的许多讲话，还有大量高层人士与“两派”民众的对话，很多都贴在大街上。人们可以看大字报，并未有像今天这样受到“限制”。这一方面，可能表现了毛泽东对自己的自信，将“文革”前许多有神秘意味的“宫廷争斗”公开，由于“东方红太阳升”，他肯定认为“中国人民”是一定会支持和依附“红太阳”的，也一定会愿意用残暴的方式打倒刘少奇、“黑修养”和一切资本主义的东西。否则为什么不在巨大的政治帷幕后面悄悄干掉刘少奇呢？另一方面，“文革”初期，中国民众极大的政治热情也是异乎寻常，虽然主要出于“誓死保卫毛主席”的政治情结，但他们也可能误以为，这是一场与自身利益相关、甚至捍卫人民权利的大斗争。无可否认，很多人在“文革”前就已经受到委屈或没有道理的压制，能够反一反那些欺压或漠视群众的“官僚分子”也是满惬意的事。但显然，“文革”的目的并不是真的为了群众，几乎没有一个“阶层”或者“群体”能在文革中始终得利并最终获胜。认识文革，认识中国政体的弊病，也不容易，中国人民是直到70年代中期，方才逐渐梦醒的，人们终于在烦躁和痛苦中重新认识了文革。当然，尽管文革中人们对国家政治了解还算不少，也还会有不少“上层人物”的大量活动不为人们所知，这也是正常的。就是那些普通人的生活，也不可能都为人所窥知，就像《楚门的世界》（The TRUMAN Show）那样。

《晚年周恩来》在大陆是严格查禁的，反而给这本著作披上神秘色彩，帮它扩大了市场。同时，也给我们这些所谓研究人员带来不便。“文革”前乃至80年代，还有若干“内部发行”的书籍，也有些“密级”限制的内部文件，起码可以供研究人员看到各种反面意见。现在连这点气度也没有了。其实，人民自己也是有鉴别能力的，“相信群众”曾经长期作为党的一个基本信条，但要真正实行“非愚民政策”，看来也确实难到透顶。因此，看不到书的全貌，仅凭流传的只言片语评论它，难以避免片面观点。好在我这里想说的侧重是“贬周捧林”的社会思潮问题，所以，考证不周只能请读者原谅。

我曾是个在“文革”中死去活来的普通学生，但我也知道，单纯个人的感觉是不可靠的。所以在研究问题时，必须力避由于自己的处境、生存条件、周围的思想情绪给自己带来观点上的影响，但是，这并非是说说就能轻易做到的。人们的看法，总会被他周围的“存在”所影响，这是无可奈何，难以摆脱。但是作为研究人员，应当看到比自己更远的东西。

周恩来与毛泽东的分歧，按《晚年周恩来》一书所说，几乎全是肇因于苏区军事策略的不同、特别是“宁都会议”种下双方不和的根源。这是不能服人的。因军事策略不同，甚至毛泽东被撤职2年，都不足以使毛对周恩来几十年后仍有记恨。看来还应当有更深刻的原因，这就是“富田事件”。用极其残暴的手段审讯、折磨和杀害处决了好几千名红军干部，这是叫着“杀绝共产党”的蒋汪想做做不到的。远在中央的周恩来，对江西苏区“肃反”的疯狂程度开始并不清楚。当后来他来到江西苏区之后，虽然困难但最终制止了内部杀戮，否了李韶九（1），这恐怕是最使人难忘的一件事。后来的文化大革命，方式不同，实质上仍然是一种内部杀戮。千千万万曾投身流血革命的人们，又开始在“群众专政”下流血了，但这一次周恩来的地位不同了，历史不再有侥幸了，他已经无力像当年在苏区那样、制止已被伟大领袖发动起来的亿万群众的“暴烈的行动”了。

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温文尔雅、也高高在上的周恩来就将不为民众所了解。但是有了“文革”之后，他的许多言行都贴在大街上，普通百姓才切身感受到周恩来。当然，还会有更多细节，不为人们所知。但我们这些普通人，从“街上的”大字报上找到的感觉是：字里行间周恩

来表现出来的是一种善，而林彪表现出来的是恶。周恩来绝对不是没有可指摘之处，凡是人都会有弱点，但“文革”中多数老百姓还是觉得能够谅解他，并不仅因为周恩来长有一张善良的面孔。“他有为难之处”，“他没办法呀”，在文革中我常听到人们这样说他。但谁也不会说，“林彪他为难呀、他没办法呀”。人民的总体感觉，还是不会有大错谬。“文革”初期，林彪除了将毛泽东吹到天上去，就是穷凶极恶地整罗瑞卿、贺龙等，1967年的720事件后他跑到天安门上去亲自喊叫“打倒陈再道”。他创造性地、而又准确地说：这次文化大革命是整干部的运动，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干部要整，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干部也要整。他积极支持“揪军内一小撮”，还提出要打倒“带枪的刘邓路线”。林彪在“文革”前期是努力投入的，那时他代表着邪恶。他曾经凶狠地说：政权，就是镇压之权！

我们中国人虽然总体上善良怯懦，可也常常有邪恶之徒。总体善良，但易于依附强权，巴结获胜者或权贵者，而不是同情和支持弱者。邪恶之徒则直接歌颂邪恶。网上大有人称赞林比周好，说毛也比周好，因为周是虚伪的。好像这些年轻的学者是多么不虚伪、多么鄙视虚伪似的。周的善，被说成伪善；林的恶，却反而被说成直爽。毛贵为天子，好像天生拥有了生杀大权。这就好比一个人挨打了，他不是指责那棍棒手，却去责怪旁边说“不要打了”的那另一人。他可能还会说：“你为什么不让他打我？这是虚伪！其实你心里也想让他打我！而这个打我的行刑者是个英雄，是林彪，你知道吗？”还能说这是种什么人呢？这是被虐狂，不是理论家。但愿我们中国人民不是这样的，不要被人家用打了以后，还要赞美人家是英雄。

周除了在江西苏区肃反时得罪了毛，后来在长江局又曾经与毛意见相左。特别是在建国后1956年反冒进的一系列作为，使得毛泽东大为气恼。周还说他作为一个总理，“从良心上”不能同意毛在1956年追加20亿投资，并后来又提出辞职。据说，毛因此曾经想让柯庆施做总理。1958年1月的南宁会议上毛点了周和陈云的名字，说他离右派还差50米，还说以后再也不许提“反冒进”……，这一系列行动给了周恩来巨大的压力，迫使他不断地向毛泽东做思想检讨。顺便说说，在中国，所谓“检讨”是个很怪异的东西，并不是检查事实，而是检查思想；不是对事，而是对人；不是总结教训或提出今后措施，而是要求对“君主”表示忠心。所以，周必须长年累月地向毛作检查，表示忠诚，根本原因是：毛对周不放心。现在有年轻人认为不能原谅周，说他是“忠君”思想，其实周既然50年代就主动提出辞职，并非是个“恋栈不去”的人。只是，我感觉，人到了这个层次上，到了中国这个国度，想退出往往都办不到。刘少奇文革初期也曾提出辞职，想回乡做老百姓，但这时他哪里还能掌握自己步入地狱的苦难命运呢？与现代西方国家完全不同，这就是中国皇权式政治残酷的地方。刘、周是仅次于“最高领袖”的人，政治生活如此之难，中国政治生活的自由度可想而知。难怪苏东坡先生曾在被下放时填词说，“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夜阑风静觥纹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最后两句也是诗人无奈的喟叹和神往。庐山会议之后，全国出现空前的经济灾难，直到3年之后刘、周联手将经济危局扳过来，但毛却更加视二人为异己。所以，周恩来和毛泽东的关系有不谐，不是从文革才开始。《晚年周恩来》论周，从苏区的军事斗争，一下子跳到“文革”，又有不少考证不足的猜想，难以把周说清楚。再说，其实周恩来的个人史是否清楚，也并非中国该段历史的症结所在。现今的人们常是“精英史观”，认为历史就是“精英们”的个人史，就是思想深刻的顾准先生也持有这个看法。

而中国人民在1976年“四五运动”中表现出来的对周恩来的怀念，是表示中华民族对善的认可，人们已经厌烦了邪恶的文化大革命。即使《晚年周恩来》当时就已出版，也不可能阻止四五运动的爆发！一旦人民真成了火山，那是谁也挡不住的。

《晚年周恩来》认为，毛曾经在1972年准备将权力交给周，其依据是否经得起考证？令人怀疑。现在可以看出，毛在“文革”中，实际上有两个目标，一是刘少奇，一是周恩来。

这样才合乎逻辑。毛从未考虑过是否由周作他的接班人，而且，他要千方百计地阻止周最终掌握最高权力，这是他的一个最大心病。刘少奇被打倒后，周的位子也岌岌可危，这是普通老百姓当时都可以感觉到的。1967年5月，出现“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的反周大字报，令人感觉到是有“来头”的。当时就有人对我分析说，这是一种试探，看看“反周”一下会怎么样，可能毛觉得时机未到，后来就停下来了。为消除这件事可能的消极后果，还把爱将戚本禹等人抓起来，做了牺牲品。“九大”召开时，看得出毛高兴非常，笑得合不拢嘴。但是林彪死亡之后，对于毛来说，一个现实的威胁来了，周已经无可避免地要排在第二位了。怎么办？要表示出毛的想法，当然难不倒政治经验丰富的毛泽东。最清楚的是，毛将王洪文排到第三位，而且在“十大”一个什么委员会里，毛故意指名王洪文为主任，周恩来为第一副主任。在这里，毛的“宏韬大略”已是向全国人民昭示了：周恩来绝不是他的接班人。但人民是不是明白呢？于是，接二连三的运动又来了，什么“批林批孔批周公”、“批党内大儒”、“评水浒”、“反投降派”等一系列动作出现了，矛头所向显然就是周，为什么总跟他过不去？他不是一直做牛做马吗？其深远意义就是不能让周将来坐上第一把交椅。所以，1973年底邓批周时说“你是可望又可即”，一方面要深深刺痛周，让“批周”达到最大的力度；主要目的显然是，让毛看到邓明白这一点的。如果周恩来没有生大病，真正对“最高位置”形成了客观上自然产生的、无可奈何的威胁，周有可能会得到更惨得多的终局。因为毛是绝不会让周成为全国最高人物的。到那时邓的态度会如何，也很难说。到了文革后期，这个“取向”还不完全取决于历史恩怨，还有毛可能会害怕周恩来改变“文革”的历史地位，从而改变毛的历史地位。周不仅有这个能力，也可能会有这动机，周对文革肯定一直有自己的看法，这推理合于逻辑。但是事与愿违，最终，毛自己改变了自己的历史地位。

国内经常倾情宣传的感人一幕：周在临终时进手术室前一瞬间，忽然叫邓过去，并对他喊道：这一年证明，“你比我强得多”。然后，又忽然大声喊：“我不是投降派！”众人愕然。国内的宣传界都说，这是周恩来极度赞许邓的工作，并为了在“反击右倾翻案风”中支持邓。《晚年周恩来》也是这个看法。但是周恩来已到了生命的最后时刻，他还在念念不忘“工作”吗？心中仍然完全“无我”吗？这不合乎人之常情。我总觉得，其中“隐台词”应当是这样：“邓先生，我现在已经没有‘可望可即’的问题了，你们不能把我死后打成共产党的叛徒！”若果真是如此，便可以想见一个濒死的老人，对于人世间已经无可奈何，又难以正常表述，心中万分凄苦，难怪他要听黛玉的葬花辞，以寻求一点心灵的慰藉。多少年来，他一定深深地感到了“风刀霜剑严相逼”，也永远不能知道“他年葬依知是谁”。所以，若是直到如今，人们仍然不能正解他的临终话语，他怕真的要化作杜鹃、子规啼血了。

而从中央电视台关于《邓小平》的电视片看来，毛在1959年就已经讲过“邓为副帅”。据赫鲁晓夫的回忆录，早在1957年毛在莫斯科对赫数落了刘周朱等政治局的成员、“他把一切都说得漆黑一团”之后，“唯一一个”受到赞许的便是邓，毛说他有“远大的前程”（2）。显然，赫颇感意外，为什么历来对“干涉别国内务”非常反感的毛对赫这样说，其动机是什么？需要从赫鲁晓夫那里得到什么？而当时，赫对邓却一无所知。邓七大时在党内排第25位，开国大典时排17位，也难怪赫鲁晓夫不知道他。约1974年，我曾听到“国外敌台”分析为什么邓不可思议地忽然得到了毛的“解放”并重用，主要原因是林彪死后、张春桥等人没有能力取代周，所以必须让邓回来对抗周。这是一种说法，表明当时一些外国人的看法，是否合乎逻辑？就要别作分析了。另据“文革”中小道消息说，毛在1962年就曾想要邓取代刘，所以毫无疑问，毛确曾希望邓作接班人，甚至1975—1976年也没有把事做绝，而绝对不能让周成为接班人。从1962—1966年也可以看出，毛先后选择了邓和林来取代刘，没有周的事，因为这是毛铁定的第一原则。

至于江青，不过是一个政治丑角儿，尽管《晚年周恩来》一再写到他们。我想周也不会相信她那一帮子人将来能成大事，所以，周要对邓说出“我不是投降派”这句最后的话。

就我个人的感受，当周恩来去世消息传来的时候，当时真感到绝望。而且我觉得，全国人民都深深地为“绝望”二字所笼罩。当时人民的感受是：不管文化革命怎样胡闹，最终毛死了，这段历史终要结束的。反正只要周恩来在，一切还会恢复正常。但是现在他却先离开了世界，人们一下子精神上别不过弯来，因此，北京城里出现了对总理的百万送葬队伍，惊天地、泣鬼神，全国各地都没管上面的规定、完全自发地举行了对周的追悼活动，其肃穆的程度前所未见。人们在哭总理，也在哭自己。而“四五”裹挟着亿万人的迷茫、痛苦和绝望，卷到了天安门广场，掀起了建国以来京城中心的第一次巨大风暴，它震撼了世界，也震撼了中南海。

我不想猜测毛对周死亡的感受，《晚年周恩来》对这一点已说得很清楚。我主要想说说中国人的感受，特别是后来令人难受的一面。周死去已经快三十年了，对这样一个鞠躬尽瘁的悲剧人物，中国当代评论家们并没有饶过他。中国人的思潮和海潮不一样，没有一定之规，在改革1 / 4个世纪之后，若干原有的道德观念已经崩塌，建立在“中国特色的”市场意识之上的自私自利、渴望暴发横财的心态几乎毒化了所有的中国人。所以，中国新人类观察世界，已失去常态。我说的这个“常态”是就西方国家人们的普遍心态来参照的。目前，这种思潮在中国现代史领域的一个特色论点，就是贬斥周恩来、而推崇林彪。

也许由于国内对精英（包括傻子瓜子一类恶人）的狂热推崇，国内的思想界几乎对一切精英人物都有崇拜心理。现在不少中国人可以原谅任何“精英”人物，从秦始皇开始，汉武帝、曹操、成吉思汗、朱元璋、乾隆、曾国藩、李鸿章、袁世凯、蒋介石、毛泽东、林彪等，这些精英不管犯了什么错误或者罪孽，不管害死了多少人，都是英雄。但是中国人常常不能原谅弱者。为什么林彪可以原谅，而周恩来不可原谅？因为周恩来还是弱者，在党内不是个凶狠角色。情况正如鲁迅先生所说，中国一向就少有“失败的英雄”。更为可笑的，网上居然还有中国社科院学者“痛说民族英雄蒋介石”的奇闻（3）。蒋介石热，在中国大陆出版界也是相当可笑的一大热。在这个蒋介石的脑袋里，既不懂民主制度，又无民主思想，正是他，不仅喜爱德国法西斯的理论，而且政治上提出“一个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在经济上实行“统制经济”政策，即使在內战中到1949年还是将全国85%的工业固定资产集中在国民党政府手中；在思想上则是要求“忠于党和领袖”；在文化上则坚持新闻审查，文化围剿，容不得不同声音，特务横行，滥杀政治犯，刺杀民主人士……。我不知道，对这样一个独裁者，“学者”们爱从何来？中国文章经常会猛烈吹捧暴君屠夫这些所谓“白骨精英”，难道杀人如麻的秦始皇、曹操、成吉思汗、曾国藩、李鸿章等还不够捧，现在又抬出蒋介石了！千百万无辜人民的生命，在许多学者眼中贱如粪土，中国的学者决不都是善良之辈，在有些学人的文章中“白骨”和“精英”可以自然地粘连在一起，令人感到在我国的“学术”园地之上，似也会常常飘来丝丝血腥。

（下略）

注解：

- 1.《红太阳是怎样升起来的》51页
- 2.《最后的遗言》（赫鲁晓夫回忆录续集）392页
- 3.在网上能轻易搜索到，在中国社科院网站上则有一篇杨天石先生的辩解。

---

本期编辑：

华新民（美国）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思语（美国）

《CND》总编：

陈天寒（美国）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专用地址：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获取

中文文件：hxwz-info@cnd.org 英文文件：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http://www.cnd.org/>

---